昆明学院学报　2019，41（4）：10～15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新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1840—1927 年）研究述评

王一典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1840—1927 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与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两个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要想厘清这些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完善研究：一、对“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二、研究者在史料方面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三、如何去理解中国语境里的“儿童”。

关键词：清晚期；五四时期；新时期；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9）04－0010－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4.002

On the Occurrence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1840－1927）

WANG Yidian
（School of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China　210097）

Abstract：Since the new period，the research on the occurrence period of Chinese 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1840－1927）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occurrence time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the concrete literary practice of this period from many perspectives. When did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originate? Is there an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ncient China? Up to now，it is still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se problems，three aspects can be analyzed：first，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second，the researchers' own value stand in ter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ird，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May Fourth period；new era；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occurrence period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晚清至“五四”时期是学界公认的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新时期以来，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层出不穷。通过梳理已有文献，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和从多个角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审视“晚清—‘五四’”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文学，并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

收稿日期：2019－03－20
作者简介：王一典（1996—），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

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

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 2019 年出版的专著 *Literature's Children*：*The Critical Child and the Art of 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 1908 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 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 1903－1927 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

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 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 1926—1927 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

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 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 1902—1904 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 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 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第三，儿童文学本身牵涉的概念很多，它包含了“儿童”“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和“文学观”“文学”等多种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儿童文学与通俗文学一样，是以“读者群”来界定自身

的，这本身就使得这一概念充满了矛盾和含混。而在晚清至“五四”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多种话语资源在此交汇，就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此，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认为“儿童”是成人的一种想象。但是，儿童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想象方式。熊秉真在其英文专著《慈航：帝国晚期的儿童和童年》（*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的序言里提出：“在帝国晚期的中国，存在着三种想象儿童的方式：一是从生理学意义上定义，认为儿童是个体生命的早期阶段；二是从社会地位来定义，处于从属位置的、通常被赋予“子”的称呼的成员，如家庭里年轻相对于年老的，这通常与年龄无关；三是从哲学和美学意义上来定义，指向与“童心说”相关的“纯真”的象征意义。”[17]6－7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语境里的“儿童”很有启发意义。儿童在何种层面上被想象？如何被想象？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探究。

晚清至“五四”时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关键时期，“五四”距今已经一百多年，如何在当今的语境下重新解读“五四”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或许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

［2］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概论［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3］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

［4］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993：45.

［5］吴其南．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30.

［6］谭元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5.

［7］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8］朱自强．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儿童文学不是古有已之［J］．中国文学研究，2014（3）：101－105.

［9］杜传坤．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J］．学前教育研究，2010（1）：16－21.

［10］LOUISE J. Literature′s Children：The Critical Child and the Art of Idealization［M］. London：Bloomsbury，2019：1－2.

［11］张建青．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D］.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4.

［12］孙建江．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5）：159－166.

［13］谈凤霞．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J］．南京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版），2005（3）：139－143.

［14］张梅．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8）：174－183.

［15］吴翔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J］．文艺争鸣，2013（11）：27－33.

［16］谈凤霞．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J］．鲁迅研究月刊，2002（1）：64－69.

［17］琼斯．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G］//徐兰君，琼斯．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徐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8.

［19］李玮．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J］．鲁迅研究月刊，2018（11）：39－45.

［20］宋莉华．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J］．文学遗产，2009（6）：87－98.

［21］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M］．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8－151.

［22］陈恩黎．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J］．文学争鸣，2012（6）：103－107.

［23］李艳利．《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1.

［24］胡丽娜．《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J］．文艺争鸣，2016（9）：115－120.

［25］王蕾．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6－54.